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錢
穆

中国文化中
“报”“保”“包”之意义

杨联陞 著

中華書局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錢穆

中国文化中 “报”“保”“包”之意义

杨联陞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杨联陞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6.9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ISBN 978-7-101-12081-3

I. 中… II. 杨… III. 中华文化—研究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5691 号

©香港中文大学 1979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书 名 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著 者 杨联陞

丛 书 名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4 $\frac{3}{4}$ 字数 75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081-3

定 价 32.00 元

图书策划:活字文化 ■

总 序

金耀基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校六十周年，新亚书院之出现于海隅香江，实是中国文化一大因缘之事。六十年前，几个流亡的读书人，有感于中国文化风雨飘摇，不绝如缕，遂有承继中华传统、发扬中国文化之大愿，缘此而有新亚书院之诞生。老师宿儒虽颠沛困顿而著述不停，师生相濡以沫，弦歌不辍而文风蔚然，新亚卒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下简称“中文大学”或“中大”）成立，新亚与崇基、联合成为中大三成员书院。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愿景。新亚为中国文化立命的事业，因而有了一更坚强的制度性基础。1977年，我有缘出任新亚书院院长，总觉新亚未来之发展，途有多趋，但归根结底，总以激扬学术风气、树立文化风格为首要。因此，我与新亚同仁决意推动一些长期性的学术文化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特别有关之“学术讲座”为重要目标。我对新亚的学术讲座

提出了如下的构想：

“新亚学术讲座”拟设为一永久之制度。此讲座由“新亚学术基金”专款设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请中外杰出学人来院作一系列之公开演讲，为期两周至一个月，年复一年，赓续无断，与新亚同寿。“学术讲座”主要之意义有四：在此“讲座”制度下，每年有杰出之学人川流来书院讲学，不但可扩大同学之视野，本院同仁亦得与世界各地学人切磋学问，析理辩难，交流无碍，以发扬学术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讲座之讲者固为学有专精之学人，但讲座之论题则尽量求其契合关乎学术文化、社会、人生根源之大问题，超越专业学科之狭隘界限，深入浅出。此不但可触引广泛之回应，更可丰富新亚通识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讲座采公开演讲方式，对外界开放。我（个人）相信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有一距离，以维护大学追求真理之客观精神，但距离非隔离，学术亦正用以济世。讲座之向外开放，要在增加大学与社会之联系与感通。此其三。讲座之系列演讲，当予以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并尽可能以中英文出版，盖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学人意见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亚书院第一个成立的学术讲座是“钱宾四先生学术

文化讲座”。此讲座以钱宾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钱穆宾四先生为新亚书院创办人，一也。宾四先生为成就卓越之学人，二也。新亚对宾四先生创校之功德及学术之贡献，实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年，讲座成立，我们即邀请讲座以他命名的宾四先生为第一次讲座之讲者。八十三岁之龄的钱先生缘于对新亚之深情，慨然允诺。他还称许新亚之设立学术讲座，是“一伟大之构想”，认为此一讲座“按期有人来赓续此讲座，焉知不蔚成巨观，乃与新亚同跻于日新又新，而有其无量之前途”。翌年，钱先生虽困于黄斑变性症眼疾，不良于行，然仍践诺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台湾越洋来港，重踏上阔别多年的新亚讲堂。先生开讲的第一日，慕其人乐其道者，蜂拥而至，学生、校友、香港市民千余人，成为一时之文化盛会。在院长任内，我有幸逐年亲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国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这几位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有世界声誉的学人的演讲，在新亚，在中大，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1985年，我卸下院长职责，利用大学给我的长假，到德国海德堡做访问教授，远行之前，职责所在，我还是用了一些笔墨劝动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新亚做八五年度讲座的讲者。这位自嘲为“杂家”、被汉学界奉为“宗匠”的史学家，在新亚先后三次演讲中，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三个关键词作了

渊渊入微的精彩阐释，从我的继任林聪标院长信中知道杨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固然圆满成功，而许多活动，更是多姿多姿。联陞先生给我的信中，也表示他与夫人的香港之行十分愉快，还嘱我为他的讲演集写一跋。这可说是我个人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画上了愉快的句点。此后，林聪标院长、梁秉中院长和现任的黄乃正院长，都亲力亲为，年复一年，把这个讲座办得有声有色。自杨联陞教授之后，赓续来新亚的讲座讲者有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许倬云、严耕望、墨子刻、张灏、汤一介、孟旦、方闻、刘述先、王蒙、柳存仁、安乐哲、屈志仁诸位先生。看到这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不禁使人相信，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对中国文化抱持与新亚同一情志者。新亚“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许多讲者，他们一生都在从事发扬中国文化的事业，或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他们是向同代人和后代人为中国文化做“布道”的工作。李约瑟博士说：“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的确，百年来，中国文化屡屡受到不公的对待，甚焉者，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且遭到“极端否定”的命运。正因此，新亚的钱宾四先生，终其生，志力所在，都在为中国文化招魂，为往圣继绝学，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之设立，亦正是希望通过讲座讲者之积学专识，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中国文化阐释发挥，以彰显中国文化千门万户之丰貌。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者的演讲，自首讲以来，凡有书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如有中、英文书稿者，则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同出版。三十年来，已陆续出版了不少本讲演集，也累积了许多声誉。日前，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向我表示，讲座的有些书，早已绝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出版社有意把“讲座”的一个个单行本，以丛书形式再版问世，如此则搜集方便，影响亦会扩大，并盼我为丛书作一总序。我很赞赏甘社长这个想法，更思及“讲座”与我的一段缘分，遂欣然从命。而我写此序之时，顿觉时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亚，我不禁忆起当年接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几位前辈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矣，已是西方新儒学的鲁殿灵光。钱宾四、李约瑟、小川环树、朱光潜诸先生则都已离世仙去，但我不能忘记他们的讲堂风采，不能忘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讲演集都已成为新亚书院传世的文化财产了。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目 录

迎杨联陞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林聪标）	1
引言	9
原报	13
原保	21
原包	27
附论	33
结语 致谢	49
附录一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杨联陞 著 段昌国 译）	53
附录二 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初探）（金耀基）	81
附录三 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杨联陞）	112
跋（金耀基）	136

迎杨联陞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

林聪标

(一)

新亚书院创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已经进入第八年了。这几年当中，东西鸿儒硕彦相继来港主持讲座，从文史哲各方面来阐述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他们的真知灼见不仅激发了我们对中华人文的怀思，并引起中外学者的往返切磋，激荡涟漪，这是何等的兴奋，又是何等的气派。而诸位讲者不只在他们的演讲中提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各能以他们的儒雅风范展现出他们所怀持的传统理想，在现代世界中的和谐畅顺。这正是体现了卅六年前成立新亚书院诸君子创校时所抱的崇高理想。今天，新亚书院已茁壮成长，成为中文大学的一分子，但本院对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使命依然不敢一日稍懈。在前任院长金耀基教授之努力下，我们今天很高兴能请到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主持今年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这实是

新亚的一项大喜事，也是新亚的光荣。

(二)

联陞先生代表了博闻强记、学贯古今的通儒传统，也代表了知识即乐趣、致知能自足的文士理想。这样的人在当今学术界中已逐渐稀少。在这个处处讲求体系、架构，或模式的专业时代里，能够正本清源，博览历代群书，具偶因一得而欣慰不已的谦虚心境的人，反而能特别激发别人的共鸣，同侪之钦佩。联陞先生的学问旨趣正在于此。

但联陞先生更是当世卓越的汉学家，是中国生活艺术和中华文化的最佳诠释者。从保定到清华；从清华到哈佛，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无非是这一个精神的绝妙境界。这样的神趣看似细微，却非有深厚的学力和锲而不舍的勤劳不为功。联陞先生的天资和造诣正透过数十年中西学术的交互冲击而臻于成熟。

近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当然是由乾嘉史学因缘发展而成，由札记考证、名物训诂而进以贯通史事，探究风俗典章，遂蔚为大观。但十九、二十世纪中西交通发达，西洋史学的绵延扩大由考古者所发扬，每以博闻广问、记诵考索为根本，自不免与乾嘉以降的史法史识相互为用，而援引壮大。尤有进者，当代社会学、经济学之发达也直接塑造了民国以来史学研究的风尚。在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大师的

开拓下，在故都的浓郁学风中，于民国初年熏陶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史学家。

1933年，先生到清华大学读书时正赶上了这一场风云际会。国文老师朱自清、英文老师叶公超、日文老师钱稻孙、政治学老师浦薛凤、中国通史及秦汉史老师雷海宗、西洋通史老师刘崇紘、隋唐史老师陈寅恪、中国社会史老师陶希圣、中国学术史老师张荫麟、中西交通史老师张星烺，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近代中国学界的翘楚。就在这一段潜移默化的日子中，先生奠定了日后数十年研究的深厚基础。

先生早岁之志趣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著作甚丰，范围包括税制、信贷、度量衡及社会结构等专题。《东汉的豪族》一文尤为人们所记诵，是当代史学对中国中古门阀社会之渊源做出初步探索工作的名著。

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多由东瀛学者开其端；仁井田陞、曾我部静雄、加藤繁，以至于现在的寺田隆信、池田温、斯波义信等都曾先后做出贡献，而先生因熟习日文，能与日本学界相互发明，与当年《食货半月刊》诸人之努力配合，替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带来了不拘于教条、不耻下问，且兼容并蓄的风尚。可惜这种博采证据，活用学说的态度，后来由于日寇侵华而不能持续下去。

然而在举世滔滔，沉醉于所谓科学史观之潮流时，先生却持守其通儒的素志，精通文字、语音乃至敦煌、甲

骨之学，所写篇章文字每多新意。当年日本学者之受益于先生者指不胜数，初不以治经济史或社会史者为限，连正统汉学的学者像和田清、平冈武夫、宇都宫清吉等也都曾与先生交接论学。

1941年，先生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从此进入了学术生涯的新页。

(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哈佛校园已经结集了众多的中国专家，而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文图书收藏也是新大陆数一数二的。先生在哈佛四年，继续钻研经济史，以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考取博士学位。期间先生并与赵元任先生主持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编成《国语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及《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两书问世。当年在这所学校受训出来的多位学生日后都成为知名的汉学大师，其中尤以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最享盛望。

但先生之最突出成就在于经济史方面。《晋书食货志译注》及《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两书是先生成名之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汉学之传统日渐式微，而讲究新途径的中国研究逐渐抬头，如何重估旧材料与新说发明，俾使传

统社会的面貌得以重新展露，这就需要一番深厚的探索；非有旧学之根底与新知之巧妙，而不为功。先生在这转型期开创的功劳实在十分重要，令人向往、尊崇不已。

但是为学不可独沽一味。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天地宇宙的奥秘是透过力行与思维双管齐下而进行研究。知识与教学相长，方能成就博大；旧学与新知交融，六经皆我注脚，这种情趣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一介书生孜孜不倦地在著名的哈佛园中宣述这种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历数十年而不怠，终使治学范围逐日扩大，心胸怡然自得。从围棋到书法，自龟甲至“六博”，真是举手投足莫非学问，书评杂著无不妙品。先生这种气势不只赢得“活百科全书”的盛名，更为许多由灿烂归于平静的大学者所欣羡神往，而相互期许。

近代法国伟大的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便这样说他：

杨教授喜欢拿他的学问与在历史汪洋大海的海滨拾贝壳相比。我必须说，挑选细石或贝壳必须对海滨有全盘的视野和认识，这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但是杨教授的识见却是既高明又辽阔。

戴密微说得好，因为虽然杨教授自嘲其学问为杂家，而实际上他的学问是和一己生命的成长结合在一起的。自

《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发表以后，先生在制度史及通史方面继续写作不辍，相继出版了《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等书。在他众多著述中被译成中文的亦颇为不少，遂于前年编印成《国史探微》一书刊行，一时洛阳纸贵。

这些书中所含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先生旁征博引，下笔从容，笔锋轻快，读其书如见其人，谈笑风生的丰采跃然纸上。所谓学林高手，莫此为甚。

哈佛之中国史研究得先生之参与，日益壮大。而先生的深厚影响更使该校之中国研究能保持精览原典、务实切近的特质。卅年之教学，桃李满天下。先生在国际之地位也因此更为彰著，俨然成为一代宗师。1957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授“文化奖章”，肯定先生在学术上之崇高成就。多年来先生更参与哈佛燕京学社推展亚洲研究之计划，并编审《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对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居功至伟，在华人学者中不作第二人想。

1969年，先生接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赞词说：

杨联陞：汉学宗匠，其博学明识所树立之楷模，
已为学人所矜式，而其于东西大同之旨，深有领会，

则尤为爱好和平诸人士所更宜矜式者也。

1976年先生又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赞词称：

杨教授博闻强记，学贯中西，尤精研中国制度史及中国经济史，其有关此等专史之论著，备受国际学术界之推崇。杨教授除长于著书立说外，兼善评论他人之著作，其书评之精细公允，深为学界人士所乐道。

两度荣誉真与先生在学界之贡献相互辉映。先生之成就至此可谓已实至名归了。

1980年，联陞先生从哈佛荣休，从此可以随心所欲，涉猎自己所欣赏的事物。然而先生的学术活动却仍未稍懈，对于后学的奖掖和启迪亦未或减，这正是先生生命力绵延不断的最佳写照。

(四)

联陞先生家居随和，夫人缪钊女士是名史家缪钺先生的令妹。伉俪情谊，相敬如宾，久为中外友朋所乐道。先生治学时仍不忘中国士人之风雅，凡琴棋书画皆所喜好，在传统文化逐日为人淡忘的今天，这份雅兴是我们所不宜

轻视的。先生的学问和广泛的阅历无不与追求完美和谐的生命息息相关。回望新亚书院所标示的理想，那么我们就必更能体会这份在现代世界中日渐消逝的情趣。

今年（1985）9月底先生来新亚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适与新亚校庆相配合，这是值得我们感到兴奋的机会。先生的题目：《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原报”“原保”“原包”》又正反映出先生治文字学、思想史、社会史于一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特色。此一系列之演说势将引发各方面学者的探讨与论辩。先生积数十年治学之经验，对于这几个观念的阐述必有发前人所未发的精彩。而先生一向谈话风趣，答问之际，天马行空，更必然会使听众时刻有突如其来的兴奋，引发不期然的惊讶和赞叹。

在联陞先生来港的前夕，我们回想先生在海外数十年的贡献，记述他生命与学术融会的气质，这是多么的合宜。在剑桥、巴黎、京都之外，先生也终于到了香港。相信在讲学之余，一定会别有一番滋味。更希望他在短短的访问期间，能够有宾至如归的欣喜。

1985年